

◎创作谈

有人在战壕里写作，有人在炸塌的剧场唱歌

张庆国



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“草木深”本指荒草凄凄，我也可以理解为文明之火的摇曳，但穆旦的诗《春》中的两句更合适：

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，
他渴求着拥抱你，花朵。

战争之恶面前，文明的花坚持开放，给人类送去了生活的勇气与信心。我的新书《绿色的火焰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）写抗战后方的文化活动，难度很大，我反复思索：战争时期保命要紧，还有什么更要紧？抗日战争的炮火中，中国文化毁灭停滞了，还是在继续存续甚至发展？人类在战争年代除了活着还能做什么事？我眼前亮了，有了写作的方向。

这是一部多方位描述中国文化人活动的文学作品。写一个文人没问题，写各行各业的一批文人难度就大。出现困难我就来劲，我喜欢做有挑战的事。我接着向自己发出追问：这段历史中有多少人该写？我要学习哪些行业的专业知识？我需要采访吗？找谁采访？我面对的事件已成为历史，



作家何南的新作《号角》（晨光出版社、人民日报出版社），是一部写给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长篇叙事诗，记叙了音乐家聂耳短暂而又激情澎湃的一生，再现了青年知识分子以文艺为号角，唤醒民众、激励民族奋进的历史画卷。

在叙事诗中，如何实现抒情与叙事的水乳交融？抒情过多，容易影响

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非虚构作品《大河源》，是作家阿来深入黄河腹地，在科学与文学、传统与现代、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互渗中，以冷峻而又富于温情的笔触书写黄河源的一部作品。该书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演进轨迹，挖掘黄河的文化象征意义，探寻人与自然复杂关系，是博物书写、历史书写，也是生态书写。

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，“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索河流的源头”；同样，人文学者也鲜以科学的观察与思维对河流进行知识性书写。而阿来兼具博物学家的气质与诗人的气度，不仅拥有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与敏锐的观察能力，同时又善于用诗意的笔触捕捉自然之美，赋予世间万物以鲜活的生命力。因此，阿来笔下的黄河书写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，融合科学与人文，广泛吸纳并综合运用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、地理学、生物学、气象学等多学科知识与方法。

首先，阿来运用科学方法，对黄河源区的自然物象展开博物书写。甘青铁线莲、祁连圆柏等花草树木的生长习性 & 形态特征，巴颜喀拉山、若尔盖大草原等典型地貌的形成机制与变迁特征，黄河源区复杂的水系结构特点及其动态演变等，都被作家以知

找不到健在的当事人采访，找到当事人的后代，他们也都年事已高，他们的讲述是历史事实，还是私人感情？相比古代史，抗战史更近，资料也繁杂，怎么选择？经人介绍，我结识了一位杰出的抗战史学者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我用半年时间全面学习抗战史和抗战文化史，也学习了中国现代音乐史、戏剧史，世界出版史、文物知识等，我又购买了30多本人物传记，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与行为方式，也研究一些文化名人的性格和家族史，包括一些地方史和地方风物志。那半年我读得日夜颠倒，高度兴奋，理出一个写作提纲，确定了写作内容。

还有疑问，一部纪念抗日战争的非虚构作品要怎么写？单纯重现往事吗？历史著述早有史学家写过了，史料也有专家做过整理记录，作家的文学表达空间在哪里？很多历史现场已经改变或不复存在，我出行调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思考再三，一时理不清头绪，只明白一点，历史不能坐在家中写，要去现场观察，先上路再说。

我首先寻访七七事变起始地北京卢沟桥与宛平城，接着去天津南开大学。我在天津的老街寻找张伯苓故居，曾遭遇居民的阻拦，这没事，我理解，不容易就更有内容可写。我再去上海和江苏南京等地，用3个月时间，走遍中国15省份25地。我都坐火车，保持跟大地的接触，都挑靠窗的座位，一直在车上注视窗外山河的移动，捕捉窗外一晃而去的房屋和路边的人脸。

我一边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观察和体验，一边躺在陌生城市酒店的床上，面对头顶的黑暗，紧张思考，做

诗叙聂耳不凡人生——读何南长篇叙事诗《号角》

陈 香

叙事的推进和铺陈；叙事过密，则变成了韵语的小说或散文，失去了叙事诗以“诗化意识”来反映时代和生活的本质特征。同时，与抒情诗相比，叙事诗还应有更宏大的结构，从而为反映时代与社会、展现层次丰富的人物形象提供空间。《号角》以事为经，以情为纬，既有饱含诗情的笔墨，又有得当的叙事框架和结构，更有作家内心情感的奔流。《号角》并没有片面追求情节的曲折，而是借鉴戏剧的表现手法，选取典型事件连接时空顺序。

艾青认为，“个人的痛苦与欢乐，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；时代的痛苦与欢乐，必须融合在

兼具科学观察与诗意表达——读阿来长篇非虚构作品《大河源》

张 傲 张 凡

识性写作的方式进行了精准描摹。与此同时，阿来的文字中蕴藏着灵动的诗意，他写初寻黄河源时遇到的景象是“风从天上撕扯下来那么多云雾，一下就把山头 and 一行人包裹起来”“低头，看见脚边青草间蹦跳着颗颗雪”。阿来赋予自然之物人的性灵与情感，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意。通过对风的“撕扯”及其对人的“包裹”等拟人化笔法，展现了风的肆虐与压迫，勾勒出风雨骤至、天地混沌之景象。而“蹦跳”一词，则使雪变成在青草间欢快地跳跃嬉戏的小精灵，打破了风雪带来的压抑感。在众多关于黄河的书写中，《大河源》宛如“黄河大合唱”中一个独树一帜的声部，以其特有的旋律与节奏，奏响了科学与文学的和鸣。

《大河源》也是一部传统与现代共生的深情传记。作者以“吾土吾民”的情怀，溯源黄河源头，唤醒历史记忆，挖掘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象征意义。他在书中广泛援引黄河源头地区丰富的县志史料、严谨的

出并推翻各种写作规划。随着行走路线的延伸，我的思维渐渐清晰。我明白了两点：第一，我要用人物来架构这部书，这应该是一部描述人物生命史的作品，我不能写那种见事不见人的文字；第二，我认为外出调查很重要，必须到达所有将写到的现场，但我应该不会止于调查，我行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，是积累今人寻找时间的体验。我的写作，是一段跟另一段时间的相互注目。

我有事做了，我把出行做田野调查的行程、坐的车、吃的饭、住的旅馆、见到的人和如何见到这个人，以及调查途中我的感情和思想活动记录下来。在南京长江边的浦口火车站，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，用手机写了一小时，记录下现场的建筑、行道树、商店、江水、轮船的汽笛声、路人的姿势表情以及我的思想和情感活动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街头，我找不到椅子，坐在街边的石墩上，也在手机上写了半小时。在广西河池寻访浙江大学西迁遗址的荒园，我请带路的朋友在车里等，自己站在荒园门口的阳光下，现场记下几百字。我每天晚上回到酒店，赶紧打开电脑，写采访日记，把手机上的文字取出来，再写下当天所见。搜索现场的心情，回味和思索当天行动中的思想震荡，经常持续到半夜。纵贯整个中国的寻访调查结束，我写下了15万字的采访日记。

于是，我后来写作的文本中，出现了两条叙述的河流，一条是历史事件，宽阔的记忆之河，一条是纤细的现实之水——穿越中国行走的“我”。我用文学的方式来描述记忆之河，也用细致的文学描述写下现在

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。”《号角》即是这一观念的注脚。从昆明到广州，从广州到上海，聂耳的人生起伏，连接着《渔光曲》《桃李劫》《风云儿女》等多部进步影片的上映经过，连接着《卖报歌》《毕业歌》《梅娘曲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传唱一时“人民歌曲”的创作历程，更连接着艾思奇、蒋光慈、黎锦晖、王人美、金焰、田汉、吕骥、张曙等一众进步文艺家的抗战往事。由此，作品以个体的生活与命运包孕现实与时代，再现了一个救亡图存的年代，进步文艺家捍卫祖国和民族尊严、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时代画卷。

形象的塑造，既是客观生活的提

“我”之所见所思，“我”与历史隔着时间大河对望，拓宽了文学艺术的时空。

这是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，单纯地重述历史是一种平面写作，写历史的同时，再写今天的“我”，层次会丰富。“我”在中国行走万里寻访历史现场的经历，也是书中的重要内容，“我”的视角和目光，“我”的行动，在全书的文本中与抗战时期张元济、梁思成、穆旦、沈星海等文化人的活动相互注视，整部书的叙述就呈现出立体效果，变成复调式表达，这种写法应该更好。

我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向人类文明致敬，我的文字是向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继续文化工作、并为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文人表达遥远问候，是为了探究他们社会情怀的宽度、深度以及文化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。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人类生活内容，一方面它传授知识，教人研习前辈的智慧，创造更好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它还塑造强大的人格，给人注入超越物质生存需求的精神力量，教人目光远大，具有社会责任感，无私、善良和高尚。

中国有崇文重教的传统，文人治国的历史很长，孔子供在庙里接受人们顶礼膜拜，城里有文庙，乡下的魁星阁还供个持笔的神仙，读书受到高度重视。立德立功立言，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“三不朽”。现代社会文化多元，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于精神修炼之外的文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调动最好的艺术手段，追溯抗战时期中国文人舍生忘死工作、并坚持为社会服务的历史切片，对后人会有启发和激励，把这些写出来，也算我一份微薄的文化贡献。

炼过程，也是主体情感客体化的转换与表现过程。《号角》深谙这一点。作品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时，不仅通过人物间的语言、行动等外在方式表现矛盾冲突，同时通过生命个体的所想所思来展现。由此，客体与主体的交融，内心体验和再现客观世界的双重性，使这部作品获得了浓郁的诗意。同时，《号角》一书的句式错落有致、流畅自如，看重诗的内在节奏与自然形态，使读者的阅读更为自由和愉悦；《号角》既是书名，更是贯穿全诗的核心意象，点染人物、贯通情节。以上种种，皆是作者匠心所在。

一直以来，少儿主题出版在孜孜探索更具温度的文学性、人文性表达。儿童叙事诗既有纪实性叙事为基础前提，又有虚构的想象叙事补充细节，还有属于诗歌自身的浓烈抒情性和诗化风格，组成了一个具有多重美学风貌的文学空间。《号角》的问世，无疑为我们探索少儿主题出版的新方向提供了启发。



这部作品中，阿来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模式，秉持众生平等的理念，以饱含温情与诗意的笔触，对黄河源区的湖泊、草甸、高山、花鸟、树木等自然万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呈现。在作家的认知里，“这个世界，是人的世界，也是所有生命共生共荣的世界”。他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，将人类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中，引我们重新思考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。在此意义上，《大河源》是一部具有生态思想启蒙意义的作品，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一部力作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）

雄奇的三峡，伫立千万年的神女峰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上演过多少英雄传奇。作家叶梅出生于巴东三峡，长于兹，感于兹，三峡两岸人民倚仗天险，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寇的西进，这段鄂西抗战的历史就发生在她的故乡。叶梅十年磨一剑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奉献出一部反映鄂西抗战的长篇小说《神女》（作家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）。写这部作品的冲动，源自她的血脉深处。为了写好这部作品，十多年来，叶梅多次溯江而上，走访故事发生地，搜集资料，寻访遗迹，掌握了大量素材，撰写出这部沉甸甸的作品。

作品以一只美丽的凤鸟作为见证者，凤鸟翱翔在三峡山水之间，它见证了一名三峡女儿不平凡的经历，见证了当地热血儿女投身抗日所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。

男主人公覃义蛟和女主人公凤娘，本是三峡江边一对普通的恩爱夫妻，男人强健豪爽，在江上行船为生，风里来浪里去；女人温良贤惠，勤俭持家，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，过着安乐的日子。日寇的侵略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，无情地把他们卷入战争。大敌当前，他们竭尽全力，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出力。覃义蛟在江上冒着炮火运送抗日物资，凤娘凭借自己的精湛医术救助伤员、抚慰百姓。他们与峡江命运与共，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，赋予他们山一样的坚毅、水一样的柔韧。覃义蛟从守护“小家”的船主，成长为心怀“大我”的民族脊梁。凤娘这三峡女儿“就如这三峡的山水，于静默中含有无限的坚韧”。

在叶梅笔下，一场波澜壮阔的鄂西抗战，以独特的视角、细腻的笔触、驾驭自如的笔力，从覃义蛟、凤娘这样的普通人开始描绘，更能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坚韧和血性。书中除了聚焦覃义蛟与凤娘这对夫妻，还塑造了船主覃九河家族群像。覃九河一家倾其所有，家长覃九河调用自家全部船只，派儿子参与抗战物资运送，老二覃远蛟、老三覃义蛟都投身抗战之中。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人，却有着长在骨子里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，正是无数这样的“小人物”，以各自的方式书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抗战史诗。书中也有对抗日战场的正面描写，石牌岭大战中，中国军人英勇作战，与来犯之敌殊死搏斗，体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。通过这场残酷的战争，作者不禁思考：人为什么处心积虑地伤害同类，把聪明才智用于杀戮？

“峡谷间风雨大作，霹雳声夹着闪电从天而降，大雨则像一根根利箭齐刷刷射下来。一只船在那剧烈的颠簸中逆流而上。”这画面正是覃义蛟面对风急浪高的险境勇敢前行的真实写照。作品通过鲜活的人物呈现大抢运、石牌岭大战、护送国宝等重大事件，使抗战风云真

为大国工匠立传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逆境中绽放——杨辉素《卢仁峰：为国铸“剑”的独手焊工》新书分享会在河北文学馆举行。该书讲述了“大国工匠”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卢仁峰的奋斗历程，细腻呈现新时代大国工匠的精神世界。

与会嘉宾认为，该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将客观叙事与文学性描绘有机结合，实现了技术细节展示与精神内核挖掘的双重突破。在叙述节奏上，作品张弛有度，既呈现主人公攻克技术难关时聚精会神、近乎

河南推动豫籍文艺名家“归根还巢”

本报电（徐妍迪）近年来，河南省文联积极开展鼓励豫籍在外文艺名家“归根还巢”工作，先后为豫籍文学名家周大新、李洱、刘庆邦、宗璞成立研究中心，并开展相关学术交流、文学讲堂、青年作家扶持等工作，引起全国文学界关注。

近日，乔叶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河南郑州举行。活动由河南省文联主办，河南省作协、中原文学杂志社承办。

乔叶是当代作家，出版有中篇小说《最慢的是活着》，长篇小说《认罪书》《藏珠记》《宝水》，散文集《深夜醒来》《走神》等，曾获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。多部作品被译介到俄罗斯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国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活动中说，乔叶及其作品“底蕴醇厚、宝水如镜、气质率真”，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创作中、在“跑村”“泡村”的实践思考中，坚持与时代同步伫，其文学书写具有丰沛的情感。希望以乔叶研究中心成立为契机，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。

乔叶表示：“河南是故乡，是我与生俱来不可替代的故乡，不仅是地理维度的，更是精神维度的。我所有的文字，都是这块文学土地长出来的‘文学庄稼’。”她提到，“老家河南”成立乔叶研究中心，既是一种“温暖的召唤”，也是自己获得批评指导的有效平台。

回荡在三峡间的抗日壮歌——读叶梅长篇小说《神女》

杨 鸥



实可感。

作品在书写这场战争的同时，也写了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他们中有巴东县长于良仲这样正直的官员，也有邮政局长尤占坝这样险恶的小人、赖成绪这样发国难财的黑帮人物，也写出了普通百姓的苦难与顽强，展现纷繁复杂的社会众生相。

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。”这两句我们熟悉的诗写的就是这个地方。书中展开了一幅三峡人家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卷，土家族的吊脚楼、龙船调，还有过赶年的习俗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。三峡普通人家的生活充满人间烟火气，他们世代代生活在这里，与这片土地血肉相连。这里也是叶梅的故乡，她以浓厚的乡情、深沉的爱，展现家乡人、家乡事、家乡的英雄史诗，让书中的人物和故事令人如此难以忘怀。战争破坏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，对和平安定 的美好向往，更衬托出战争的残酷。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深入思考。

浩荡的长江赋予叶梅大情怀，万千风云在她胸中激荡，化作她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。在壮美三峡间回荡的这曲动人心魄的抗日壮歌，在今天，依然不绝如缕。